

中国的犹太研究

徐 新

内容提要 中国的犹太研究经历了 1949~ 1978 年的沉寂期。改革开放后, 犹太研究逐渐进入复苏、发展与高潮期。专事犹太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机构渐多, 关涉犹太议题的书籍和论文大量问世, 高校中犹太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日益活跃, 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更为积极, 这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犹太研究的开展和深入。犹太研究的开展使国人对中东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 能在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中东冲突的实质, 同时也促进了对犹太人在华散居历史的研究。

关键词 犹太研究 研究机构 书籍 犹太教学

作者简介 徐新, 犹太文化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南京 210093)。

中国中东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是中东冲突和中东文化。中东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 阿拉伯世界为一方, 以色列为另一方。就中东文化而言, 一个是以伊斯兰为代表的文化, 或称阿拉伯文明; 另一个则是以犹太为代表的文化, 或称希伯来文明。这两种文化成为该地区文化的主要代表。从人口或者从国土面积来说,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 但犹太文化是该地区最古老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 因此, 开展中东研究包含犹太研究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研究阶段

(一) 1949~ 1978 年

严格地说, 这期间, 中国的犹太研究并没有得到真正开展, 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与影响, 发表的有关犹太问题的书籍和文章颇为有限, 且大多是对中东形势发展和冲突事件的报道。尽管其中或许包含一些论析, 但多属于政治性和政策性的, 或以冷战思维画线, 结论往往很少带学术成分。涉及以色列社会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 由于中以无外交关系, 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很有问题。这当然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关。正如潘光所总结: “由于极‘左’思潮和十年‘文革’的冲击, 中国一度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隔绝时期, 犹太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制约。”¹ 这显然是中国犹太研究的沉寂期。鉴此, 我们无法对该时期的研究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分析。

(二) 1979~ 2009 年

改革开放促进了犹太研究在中国的重新开展。不过, 最初的十年 (1979~ 1988 年) 为犹太研究复苏时期, 属于思想准备、人才培养和学术积累的阶段。犹太研究的学术氛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始形成, 学术界开始认识到此研究领域的存在和开展这一研究的意义。

从研究成果来看, 首先映入人们视野的是对在华犹太人的研究。自唐代以来就有史料证明犹太人

¹ 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 1978~ 2008》,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 页。

在中国的存在，著名的开封犹太社团自宋代起就生活在中国，并作为一个犹太人社团而存在。而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有近 4 万犹太人在不同时期来到中国一些城市生活。他们的经历与这些城市的变迁息息相关，中国人对此是有所察觉和了解的。尽管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封的犹太人已经基本上完全融入中国社会，19 世纪中叶后来华的犹太人也大都离去。但犹太人在华的这段历史并没有为中国人民所遗忘。在中国学术界恢复生机之初，首先涉及这一研究课题是十分自然的。最初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包括潘光旦著的《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①一文，数年后又发表了由加入中国籍的犹太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撰写的文章《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历史》^②等。关于上海犹太人的文章、书籍也不断面世，^③引起了不少中国学者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对在华犹太人的研究开启了中国犹太研究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涉及犹太研究其他方面的论文也时有发表，如杨申的《论苏联犹太人》（载《外国问题研究》，1981 年第 3 期）、刘邦义的《毕沙犹太人反纳粹起义》（载《外国史知识》，1982 年第 7 期）、赵复三的《犹太教简介》（载《世界宗教资料》，1983 年第 3 期）、潘光的《古代犹太国家兴亡记》（载《历史知识》，1984 年第 1 期）、余崇健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以色列国的建立》（载《西亚非洲资料》，1984 年第 18 期）、汪池的《〈出埃及记〉的争论》（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3 期）、王庆余的《旧上海的犹太人》（载《学术季刊》，1987 年第 2 期）等。1984 年王仲义撰写的、作为单行本发行的《犹太教史话》（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小册子和 1986 年出版的由西北大学阎瑞松翻译的阿巴·埃班著的《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特别是阿巴·埃班著的《犹太史》一书的出版具有时代意义，影响深远，几乎所有当代从事犹太研究的中国学者都从该书中第一次较为详细了解到犹太民族的历史，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然，在此阶段中国还出版了若干关于纳粹屠犹、阿以冲突、以色列名人传记等许多方面的书籍，表明中国学术界对涉及犹太研究领域不同议题的关注。这些书籍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青年人，对犹太人产生兴趣，开始关注与犹太有关的问题。若干在随后犹太研究领域发挥骨干作用的中国犹太学研究者就是在这氛围中成长的。

顾晓鸣 1987 年发表的《犹太学及其研究视野》（载《外国语》，1987 年第 3 期）和《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载《复旦学报》，1987 年第 3 期）论文表明中国学者对犹太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与思考。文章呼吁建立某种犹太研究的体系，以便能够推动犹太研究在中国的开展。而且顾晓鸣身体力行，其博士论文^④即围绕犹太研究而作。

至此，可以说：有意义、具学术性的中国犹太研究在兴起。具体地说，它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2000 年后逐步形成高潮。中国犹太研究在这 20 年中取得了哪些进展？有何特色？主要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对这 20 年犹太研究的概括和分析，同时也是我们判断中国犹太研究深入开展的标准。

研究机构的建立

犹太研究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出现是犹太研究在中国向一个高起点发展的重要标志与评判标准。它们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无论是 1988 年成立的上海犹太学研究会，1989 年成立

^① 本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3 期。需要指出，此时的潘光旦已经过世。该文是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一直没有发表。同名著作于 1983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

^② 参见《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1983 年。

^③ 主要有张仲礼、陈曾年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④ 参见顾晓鸣著：《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¹ 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立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犹太文化研究中心(所),^④ 都是这样的机构和学术团体。这使犹太研究的深入开展有了组织保障和交流的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是在中国研究界最早成立的专事犹太研究的机构, 已成为一个研究基础坚实、地方学术特色鲜明的研究团体。^④ 2004 年, 该中心由上海社科院确定为“特色学科”^Ⅲ, 受到上海社科界的极大重视, 在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由该中心研究人员编撰的《犹太人在上海》(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1 年版)、《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 年版) 大型画册在世界范围受到好评。多年来, 该中心研究人员承担若干国家和上海市的研究课题, 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影响深远。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成立于中以建交的 1992 年(最初名为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除开展犹太研究外, 该研究所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国高校率先开设一系列犹太文化课程, 招收、指导犹太历史文化和犹太教研究方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该研究所举办过 3 期犹太历史文化暑期培训班, 接受培训的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超过 100 人。此外, 该研究所还建立起了可能是国内最大的犹太学图书馆, 收藏有上万册涵盖犹太研究方方面面的英文图书, 为犹太问题研究提供了图书和资料保障。

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1994 年, 2004 年成功申请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并更名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该中心在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方面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梯队, 招收、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特别是在犹太哲学研究方面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作为中国最大、级别最高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尽管一直未建立专门研究犹太文化的机构, 但属下的西亚非洲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均有研究人员专事相关犹太问题的研究, 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上代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水准。专事犹太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机构还有力地促进了犹太研究的国内外交流, 提升中国犹太研究的国际水准。

大量研究成果的问世

据不完全统计, 近 20 年来, 我国出版的涉及犹太文化的书籍在 600 部之上, 发表的论文超过千篇。^Ⅱ 关涉犹太议题书籍和论文的大量问世反映了犹太研究的深入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 有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成果有: (1) 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犹太文化丛书》。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关涉犹太文化的丛书, 已出版 16 部。(2) 徐新、凌继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犹太百科全书》。该百科全书共 200 余万字, 有词条 1 600 余条, 于 1993 年出版, 该书为中国犹太研究界提供了一本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涉及犹太文化的大型工具书。(3) 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丛书共十部, 虽均为译作, 但所选篇目都是“已在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 且能够代表某一领域的学术水平的优秀力作”^Ⅲ, 学术含量高。上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国犹太研究取得的成就。如果说在 21 世纪到来之前, 中国出版的绝大多数与犹太研究有关的书籍还是以译介为主, 那么, 21 世纪以来, 由中国犹太研究学者撰写、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已成为犹太研究的主流。其中殷罡主编的《阿以冲突: 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年)、张倩红著的《困顿与

¹ 该研究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设立了自己的网站, 向国际社会报道和介绍中国的犹太研究。其网址为: <http://servercc.oakton.edu/~friend/chinajews.htm>。

^④ 这类研究中心在上海、南京、北京、济南、开封、西安、昆明、哈尔滨等城市先后成立。

^④ 潘光主编: 前引书, 第 2 页。

^Ⅲ 同上书, 第 19 页。

^Ⅱ 具体篇目可参见潘光主编: 前引书, 附录部分: 中国犹太研究著述及相关读物索引(1978~2007)。

^Ⅲ 傅有德主编: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总序, 第 11 页。

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刘洪一著的《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钟志清著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徐新著的《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肖宪著的《谜一般的犹太人》(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年版)、游斌著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年)、傅有德等著的《犹太哲学史》(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王健著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年版)、张淑清著的《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等均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犹太研究方面的论著,代表了国内犹太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外,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于2002年创办的《犹太研究》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2007年创办的《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¹成为国内主要刊登犹太研究论文的刊物。

犹太研究在高校的开展

在中国高校开展犹太研究和教学是衡量将犹太研究引向深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20多年前,几乎无任何一所中国大学开设犹太研究方面的课程和进行犹太学研究。20多年以来,中国高校中开展的这方面研究又突出地表现在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犹太文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招收与培养。这对于培养犹太研究新生力量和后继人才,特别是专业人才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希伯来语专业培养了首批中国能够掌握希伯来语的年轻一代。经过若干年培养和进一步深造,其中若干毕业生已获博士学位,活跃在各地的犹太研究机构中。另外,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和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犹太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两个研究所每年都选送若干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去以色列或者美国大学进修、进行博士论文撰写的资料查询与研究。其中不少人毕业后充实到各高校的师资队伍中,形成新的犹太研究教学增长点。2005~2009年,最初由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牵头和组织、后由不同高校主办、每年均在中国一个城市召开的“纳粹屠犹教育培训研讨会”^④,对中国大学生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屠犹事件有了深刻了解,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不断出现的否认纳粹屠犹的思潮,并对中国反击日本出现的否认南京大屠杀思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中国的其他一些高校也在开展犹太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如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自2002年一直开设犹太历史课程,培养硕士研究生,在犹太近现代史和以色列通史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云南大学、齐鲁大学、河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黑龙江大学、同济大学、长春大学、深圳大学、武汉大学等均在开设犹太学科课程。其研究成果也不断面世,推动着中国犹太研究向前发展。

犹太研究的国际交流

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这一时期中国犹太研究取得可喜成就与向纵深发展的另一标志。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各犹太研究学术团体的研究人员经常访问北美、欧洲、以色列等,特别是各犹太研究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多次应邀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参加国际会议,举办展览,发表数以百场次计的英语学术讲演。如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研究员访问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教授在国外做过300余场次的英文学术讲演,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负责人傅有德教授几乎每年都出访,进行学术讲演和交流。与此同时,中国的犹太研究机构每年还邀请若干国际犹太学者来华进行学术访问。通过这类国际交往,中国的犹太学者与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学术界、犹太

¹ 这两种刊物均以集刊形式出版,目前基本每年一辑。而《犹太研究》已经数年被评为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

^④ 该研讨会一直获得欧盟以及国外犹太研究机构的资助,主要由国际上专门研究纳粹屠犹的专家授课。

人机构, 及犹太社区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推动了犹太研究机构各项工作的开展。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犹太研究开展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举办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包括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犹太文化国际研讨会”(1996年)、“犹太人在华散居国际会议”(2002年)、“犹太教国际研讨会”(2004年); 在山东大学召开“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国际会议”(2006年)等。在上海召开的“犹太人在上海”(1994年)和“犹太人在亚洲: 比较研究”(2005年)国际会议, 及“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论坛”(2006年)和“哈尔滨与世界犹太人经贸合作国际论坛”(2007年)均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参加。这类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犹太学研究的开展, 促进了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及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

上述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犹太研究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我国在犹太研究方面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体现出中国犹太研究的进步和成就。

学术贡献与社会影响

(一) 对中东研究的贡献

犹太研究的开展使国人对中东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 且有了自己的评判和观点, 能够较为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中东存在的一系列复杂的冲突、战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东文化和社会, 为我国能够参与中东问题的国际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若干从事阿拉伯研究的学者也加入犹太研究, 许多从事犹太研究的学者在中国中东学会担任领导职务, 成为中国中东问题专家, 为国家的中东政策建言献策就是这一贡献的最好体现。犹太研究的开展还促进了我国对以色列的专题研究。目前已经出版的关于以色列的书籍可以说涵盖以色列社会的许多方面, 如阎瑞松主编的《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覃志豪著的《以色列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6年版)、杨光主编的《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孙正达等著的《以色列国》(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赵伟明著的《以色列经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邱兴著的《以色列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等。

(二) 对犹太人在华散居史研究的推动

犹太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开展促进了对犹太人在华散居史的研究。20年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对上海犹太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的成果丰富。除了前已提及的以外, 该中心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大型展览作为访问上海的多国领导人的参观点, 成为上海外事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哈尔滨犹太研究中心自2000年成立以来, 积极开展对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 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 该中心编撰的《哈尔滨犹太人》大型画册, 举办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展”都堪称一流, 成为黑龙江省对外宣传的一个独特窗口。此外, 多年来, 中国从事犹太研究学者频繁出席涉及中国犹太人的国际研讨会, 成为主要发言嘉宾。而发表的关涉在华犹太人的研究量大、面广, 既有用中文在国内发表的, 也有用外文在国际上发表的。特别是徐新用英文撰写、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开封犹太人: 历史、文化及宗教》, 刘爽著的《哈尔滨犹太侨民史》(方志出版社, 2007年版)等, 体现出中国学者在对犹太人在华散居史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毋庸置疑, 犹太研究在中国已经取得可以引以自豪的成就。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的犹太研究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对世界范围内的犹太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成为国际犹太学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詹世明)

¹ Xu X in *The Jews of Kaifeng: China's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Jersey Cit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3.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g Lincong

pp. 44– 47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fluctuated with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it had a period of “flourish” in the beginning and a period of “standstil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develop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and now it is displaying a stage of fast development. The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es not only on research patterns and fields but also on formulating some viewpoints represented by Chinese scholars. Now the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minds such problems as unbalance of research, shortage of original research, and the system and theory of the discipline are in process of formation.

Jewish Study in China

Xu Xin

pp. 54– 58

For Chinese study on Jew, 1949– 1978 was a period of standstill.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n Jew began to revive and develop a new stage. Some profess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es were set up, large numbers of books and papers on Jew were published, and lessons on Jew history and culture activated in universitie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flourished, those gave a great push to promote Chinese study on Jew.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udy on Jew will help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Middle East issue and master the identity of the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will also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life and the Diaspora History of Jew in China.

Sixty-year Study on Iran in China

Yang Xingli

pp. 63– 67

Iran,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Asian continent, and China, located in the east coast of Asia, represent two grea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Although obstructed by a considerab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restrained by the times, China's exploration on the Persian civilization has never been stopped. China started its contemporary probe and introduction to Ir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entered a flourishing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study on Iran in the 1980s. Up till now, there have been over 1,500 fruitful researches, around 50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undreds

of research scholars, with the scope expanding and the research level advanc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search on Iran, this long arduous road was built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has encountered twist and turn during the 60 years, bringing with it both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alerting frustr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century, which is full of encourag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is hoped that a specific research system such as “Iran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integrate and foster China's researches on Iran, and to bring these researches to a new height.